

Primo
Levi



SE NON ORA, QUANDO?

若非此时，何时？

[意] 普里莫·莱维 著

翁海贞 译

中信出版集团

Primo
Levi

SE NON ORA, QUANDO?

若非此时，何时？

[意] 普里莫·莱维 著

翁海贞 译

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若非此时, 何时? / (意) 普里莫·莱维著; 翁海
贞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10

书名原文: Se Non Ora, Quando?

ISBN 978-7-5086-9115-2

I. ①若… II. ①普… ②翁… III. ①长篇小说-意
大利-现代 IV. ①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4888 号

SE NON ORA, QUANDO? (IF NOT NOW, WHEN?)

by Primo Levi

Copyright © 1982, 1992, 2015 by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p.a., Torin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ulio Einaudi editore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若非此时, 何时?

著 者: [意] 普里莫·莱维

译 者: 翁海贞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092mm 1/32 印 张: 12.375 字 数: 236 千字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8-5527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115-2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导读

普里莫·莱维：
一种鉴赏

欧文·豪

有些作家——寥寥数人——会顿时触动读者切身的感应。只需阅读他们的数页文字，就会感到那种隐而未发的冥契绽放出来。通常，俘获你的不是作家的观点或作品的主题，而是叙述的语调，也许是些许苦涩幽默的真挚，又或是沉思的呢喃。

在我读来，意大利犹太人回忆录作家、小说家普里莫·莱维就是这样的作家。我生活的环境截然有别于他的文化，更有别于他的经验。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然而我阅读他的著作时，感到一种欣喜的契合。我欲展开一场想象的对话，仿佛我与普里莫·莱维是故旧，相知经年。

在他的故乡意大利，普里莫·莱维颇具声名；而在美国，他的著作仍未触及广大读者。这其中有一些常见的原因：翻译迁延，近来美国读者的品位变得狭隘，专注于自身，从而排除了很多外国作家。但另有一个更复杂的原因。莱维的名字与大屠杀文学相关联，很多人觉得，关于这方面的作品，自己已经读得够多，达到了所需要或所能承受的程度。而另有一些人——更无可非议地——被大屠杀的庸俗化公众讨论吓坏了，从而宁愿远离关于这个主题的作品。

所有这些障碍都是真确的，但我们终究会找到拆除或规避的方法，因为莱维是如此正直、严肃且迷人的作家。

他也是被我们这个世纪塑造，并留下深深烙印的作家。

他知道——难道这真的值得争议？——自己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时代。背负这种意识的作家无法假装“理解”奥斯维辛和古拉格。但他们——尤其是集中营的幸存者——知道，他们必须带着给他们留下永恒伤疤的经验活下去。他们反复地、时常强迫性地回到这个主题。我可以有把握地说，纵使宣传家和政客的大话空话令他们痛苦，他们也不得不写下去。这些作家没有选择：他们是历史的俘虏，他们的写作是出于心理需要。

年轻的普里莫·莱维完全不可能预料自己会有如此沉重的命运。一九一九年，他出生在都灵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犹太人家庭。这是欧洲最古老的意大利犹太人社区，有着著名的宗教和文学传统。然而，在莱维青少年时期，这里的犹太人早已受到同化，融入意大利社会，大多数人成为专业人士或进入知识分子阶层。有些意大利犹太人跟过去维持些许联系，不是信奉作为宗教的犹太教，就是保存关于犹太传统和知识的一缕记忆。一些犹太家庭至少仍口头传授零碎的希伯来语，以及相关的仪式和习俗。十三岁时，莱维行了受诫礼，但这个仪式并非真正地象征执守犹太教的戒律。晚年追忆年轻时代，他说起做犹太人就是做“欢喜的小异类”，仅偶尔给他跟非犹太朋友之间的友情造成困扰。那些年间，意大利似乎不曾沾染毒害欧洲社会的种族反犹主义。

年轻的莱维学的是化学专业，要不是“突如其来的”冲击——虽然现在我们知道并非“突如其来”——他或许会继续走在专业生涯的传统道路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墨

索里尼以其险恶的小丑风格，开始模仿盟友希特勒的反闪族残酷行径。家庭和周遭的生活环境皆不曾让年轻的莱维有机会熟悉犹太人数百年来习以为常的迫害，他察觉自己被傲慢或羞愧的教授“拒斥”。唯有一位资历尚浅的老师收他做博士生，甩出一句简慢而让人难忘的话：“跟我。”一九四一年，莱维获得博士学位，却因种族法而找不到化学家工作，只能在清漆厂和镍矿打零工。¹

不久后，莱维漂到意大利的文化中心米兰，在这里，他才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他得知一些意大利反法西斯的孤立群体，“仍不曾弯腰”。他听说了一些英勇无畏的事迹（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是犹太人的事迹），诸如罗塞利兄弟（Rosselli brothers）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被墨索里尼手下的恶棍谋杀；卡洛·莱维（Carlo Levi）被判流亡。大多意大利犹太社区警惕地远离政治，少数一些人抱持机会主义心态投靠法西斯，而另一些少数派参加对立阵营，其中很多人四散流亡。然而，战争年间，开始出现一种崭新而可观的抵抗运动，莱维写道：“犹太人的军事参与实则相当可观。”

一九四三年九月，他加入一支在皮德蒙特山麓活动的游击队。由于缺乏经验，这支队伍很快就被告密者出卖。莱维在十二月被捕。受法西斯审讯之时，他承认自己是犹太人，

1 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史实，以理解莱维作为作家的事业生涯，这些材料取自他的回忆录，收录于英译本 *Proof texts*（1984年），第4节，“Beyond Survival”，以及取自历史学家 H. 斯图尔特·休斯（H. Stuart Hughes）所撰《希望的囚犯》（*Prisoners of Hope*）这一可爱小书，其中讨论二十世纪的意大利犹太人作家。

“一半是出于疲惫，一半也是出于骤然涌起的傲慢的自豪”。一九四四年二月，意大利法西斯将他转到德国纳粹手中，以流放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载我们往集中营的火车装了六百五十人，其中五百二十五人随即被处死，二十九名妇女被拘留在比克瑙集中营，九十六名男子，包括我自己，被押到莫诺维兹-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是附属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集中营。从这里生还的大约只有二十名男女。由于一连串的境遇，我幸存下来：从来没有生病、得到一个意大利砌砖工帮助（他给莱维送食物）、得以在法本的实验室做了两个月化学家。幸得红军在一九四五年一月进军迅捷，我被解放出来。

正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数月里，莱维的思想成熟起来。这就是我们在他的著作中感受到的那份仁厚的敏感，既谦逊又刚毅。奥斯维辛将会是“我人生里最根本的经验……我知道倘我存活，我非要讲述这个故事不可”。很多幸存者也想“讲述这个故事”，其中有些人遭受的苦难远甚于莱维，却极少有人能以他这般深思来写作。

这里的一个原因是，在奥斯维辛之时，他与东欧犹太人囚徒产生友谊，他们教莱维一些关于意第绪文化的知识——其精神和道德的来源——这些有助于他汲取崭新的个人力量。有些来自波兰和俄罗斯的犹太人，纵然在如此非人的处境里，也依然保有良善的人性，也有些人在磨难中扭曲了心灵和道

德。莱维在所有这些人身上看到从前不曾见过的犹太价值观。对他来说，奥斯维辛“残酷地印证我作为犹太人的处境：一种谴责，一种复返，再度体验流亡和迁徙的圣经故事。这是一种悲剧的回归”……

战后，回到意大利，他从朋友那里听说一支说意第绪语的游击队，在东欧的战争里存活下来，不知如何抵达了米兰。这个故事，再加上他在奥斯维辛听说的那些故事，似乎深刻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尽管他隔了多年，出版了数部作品之后，才回头写这支意第绪游击队。一九八二年，一部以他们的经验为题材、名为《若非此时，何时？》（*If Not Now, When?*）的小说面世。¹《若非此时，何时？》在意大利深得好评，我们应将这部小说当作献给东欧犹太人的颂歌，他们欲尽绵薄之力抵抗纳粹。这是一种团结的姿势，并且也是一种默然的认同。

莱维曾在文章中指出，创作这部小说的近因是一个喧嚣的争议——可能也是徒劳无益的争议——关于犹太人在大屠杀之时的行为，人们为此激烈地辩论了数十年：

难道（犹太人）果真任人屠宰而不抵抗？……在我看来，这个讨论不符史实，沾染了偏见。作为前游击队员和被驱逐者，我深知在有些政治和心理境况下有可能抵抗，而在另一些境况下则不可能。我无意加入这场争议。然而，在我看来，这

1 莱维的书名引自拉比希列（Hillel）的著名篇章：“我若不为自己，谁会为我？我若只为自己，我是什么？若非此时，何时？”《先贤书》（*Pirké Avoth*）。

场争议饱含叙述意味，可以从中抽取可堪一读的故事……此外，我欲向那些犹太人致敬，无论寥寥数人或人数众多，他们都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重新找到尊严和自由。

一九四五年初，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出来之后，莱维却不能直接返家。由于官僚体制混乱，在最终抵达都灵之前，他在波兰和俄罗斯经历了八个月殊为怪诞的旅程。这次旅程也成为他“最根本的经验”的一部分，并且成为他最出色的著作的主题。

回到家中，莱维开始记录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然后从笔记里整理出连贯的叙述。他知道或者在写作过程中明白，自己手头这些材料，如此惊心，如此史无前例，从而如此难以拿概念去框架，因此，在追忆和描述之时，作者首先需要自律，保持严格的精确性。这是他的记忆，他必须在场，在回忆里，犹如亲眼看见、亲身承受苦难。然而正是因为故事可怖，便更加要求作者厉行隐退。读过大屠杀回忆录和虚构作品的读者都知道这份自律有多么困难，有时甚至根本做不到。这要求情感的节制和稳定的创作目标。我们觉得简直不该向幸存者提出这样的要求。然而倘若这类回忆录不愿仅仅成为或愤怒或痛苦的号啕，那么舍此而外，别无他途。

斯图尔特·休斯评论莱维的第一部作品，奥斯维辛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If This Is a Man*, 1947)，认为莱维的显著特点是“镇静，偶尔点缀着静谧的幽默”。此言切中肯綮，但我还要指出莱维作品的另一种品质，或可称之为道德蕴藉

(moral poise)。我用这个词指一种彻底地审视过去的行为，就这样一种过去能够被彻底审视的程度而言。我指的是一种记忆的强劲力量，领着莱维走进绝望，然后多多少少地走出绝望，从而使他不至于逃避在奥斯维辛真实发生的任何事情，既不避耻辱，亦不避恶化的人性，却拒不在作品之中沉溺于自宣自怜的情绪，或者滑入自嘲。很多大屠杀回忆录和虚构作品都情有可原地因此而有所损伤。

在《这是不是个人》的细密叙述的表面，萦绕着大屠杀迫使我们质疑的所有可怕的问题，关于人类和上帝不存在的问题，或者你宁愿换一种说法，关于人类的失败和寻找上帝的问题。然而莱维是足够精明的作家，深知如何避免跟主题迎面相撞——即便写作大屠杀，作家也需要一点儿精明。也许后世的人能“理解”所有这一切。眼前还不能。

正如莱维所写，因为“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语言缺乏词语来表达这种摧毁一个人的罪孽”。任何一个敏感的作家，在尝试写作大屠杀之时，都会被这个难题折磨：“我们的语言中缺乏这样的词语。”倘若这里有解决方法，那就是莱维在书中展现的缄默的机智。他知道有些事可以说，有些事不可说。他运用清雅简洁的散文，鲜少追求“大意义”或“超越”的雄辩，因为他深知面临大屠杀之时，这些手法会多么诡诈，会多么可悲地出卖我们的思想和想象的极限。

在这里，我引用 T.S. 艾略特的一段话：“唯有凭借强烈的时刻或者经年的知性努力或者两者兼具，方能赢取伟大的简洁。这代表人类精神艰苦卓绝的一大征服事迹：感觉和思想

征服语言的天然罪孽。”

我虽不能有把握地说艾略特的“语言的天然罪孽”究竟指什么，但是把这个惊人的说法应用于大部分大屠杀写作，不论是回忆录还是虚构作品，在我看来都是适合的。这样一种写作的“天然罪孽”可能是用错了功夫——或真挚或好大喜功——鞭策语言去做力不能及的事，去做超越思想、想象、祈祷所能做的事。或者指我们倾向于放纵深切的悲痛，容易学会滥用语言。更有甚者，利用大屠杀“证明”现成的意识形态和虔信主义教条。写作大屠杀之时，警惕“语言的天然罪孽”，是指作家必须控制、抗拒，甚至拒斥内心激动的迸发。并非所有“出自”心灵的东西都是真实或好的：素材必须经过筛选、锻炼。我们的语言缺乏表达“摧毁一个人”这一罪孽的词语，而所拥有的词语——在宣传里被如此滥用、侵蚀——又极容易出卖我们。

我们不禁要屈从这样一种“语言的天然罪孽”的一大原因是：一思考或写作大屠杀，人人都终究会撞上一堵迷惑之墙——大屠杀如何可能？我们若求助于知识分子的大手笔，就会称其为关于极端邪恶的问题，此说法彰然表明了应对这个问题的不可能性。最后，我们不能“理解”大屠杀，只能带着麻木的焦虑接纳这个事实而活下去。莱维默然接受这个观点，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如此出色的作家。他说，现代人的意识里充满了负罪感，抱愧竟让大屠杀这样的罪恶“被不可改变地引入世界”。这里的关键词是不可改变，暗示大屠杀之后，人类意识再不能似从前。然而这是指什么，人类意识

究竟又如何可能被改变，这极难说清。莱维没有企图说清楚。他写道，“以为人类正义能够根除”奥斯维辛的罪恶，“这一想法是愚蠢的”。以为理论能够找到立足点或者令人满意地理解这段历史，也是愚蠢的。在一些题材上，作家需要誓守严格的规避原则。

然而，对那些同患难同生死的人，莱维始终宽宏仁厚。与其说他的写作是记载那些恐怖——《这是不是个人》中并不缺乏这样的故事——毋宁说是留存记忆，见证人类拒绝停止做人，即便只能以一些可怜的象征性的姿态表达出来。《这是不是个人》里有一段震撼人心的故事：莱维回忆，某天他和数名囚徒被押去刮埋在地下的汽油箱。他们在几乎黑暗的箱内干活，十分艰难。然后，莱维的记忆深处浮现出但丁的伟大诗歌，他便讲给那些年轻的法国囚徒听，背诵道：

记着你的血统；
你的气概不是
为禽兽般的无知而造；
你被造为人
是要去追随知识和品行。

这些诗句犹如“嘹亮的号声，犹如上帝的声音”，激动着囚徒们的心灵，从而“我一时忘了自己是何人，身在何处”，而这些不幸的人或许觉得自己还是个人。

然后不带丝毫不堪承受之重，莱维平静地讲述另一个同

样关于挽救人类的故事。到集中营一周后，莱维消沉了，邈邈起来，疏于照料自己的身体。一个叫作斯坦因劳夫的囚徒严厉地教训他：

彻底地给我上了一课……这个道理我当时或之后都不曾忘记：正因为集中营是把我们贬抑为畜生的大机器，我们必须不变成畜牲……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强迫自己至少挽救这副肢骸，这副脚手架，这副文明的形式……

数星期后，斯坦因劳夫在“大机器”的“选择”中被卷走。莱维牢记着他的话。

倘若读者在莱维的第一部作品里察觉些许“犹太”精神或语调，那么他于一九六三年在意大利出版的第二部作品《休战》¹，似乎富有“意大利”韵味。某种我们素喜断定为意大利的本质的东西——欢悦的语气、细腻而自由地感受世间万物的乐趣——时或在《休战》中浮现，纵使书里的人物依然背负集中营的伤痕。这部作品记录莱维从奥斯维辛解放出来之后，一路穿越东欧返家的漂泊旅程，以强有力甚至热情奔放的节奏叙述。书中以活泼生动的文字描述那些曾为囚徒或散兵的旅伴，大多是年轻人，惊讶于自己的幸存。他们衣衫褴褛，饥肠辘辘，自由地体味人类生存最平常的感受，这份心虚的

1 美国译本书名为 *The Reawakening*，英国译本书名为 *The Truce*。

欢喜在他们心头涌动。叙述者屈从于自己带着微笑看待依然刺痛的不幸遭遇而感到的愉悦之时，这部作品本身也流露那份心虚的欢喜，然而在回归人类王国的旅程的故事里，这些是能够承受甚至可接受的不幸遭遇。

莱维与同伴们一路游荡，穿越波兰和俄罗斯，其经历类似流浪汉冒险小说的古怪翻版。就叙述层面来说，《休战》看似模仿流浪汉小说的传统模式：一连串略显滑稽的插曲松散地串连，讲故事者是身处故事中心的叙述者-旁观者，本人似乎并不自主行动，而是“接纳”同伴的行动。然而这部作品的基本精神却与流浪汉小说相反。在叙述的外在形式与记忆的内在涌动之间，存在着一股绷紧的紧张感——颇似起初拘谨地品尝自由与集中营威迫的形象之间的紧张感。在叙述中维持这份紧张是文学技巧上的一大造诣。

莱维尤其擅长讲花絮，在这部作品里，这份天赋得以轻易地施展。他从一个人物转到另一个人物，每个人都是通过屈从于某种自由的感受，甚至是自找的而不是被强加的困惑和痛苦的感受，在其中体验生命的欢喜，从而完成某种回归人生的仪式。对于罗马平民区特拉斯提弗列（Trastevere）来的年轻的粗汉子塞萨尔来说，这种自由的感受意味着动用他仍然记得的全部叫卖伎俩，在一个被战争摧毁的波兰城市耍花招骗市民：

原来江湖骗子的骗术没有我想的那么人尽皆知，至少这些波兰市民似乎没见识过这一套，都看呆了。不过话又说回

来，塞萨尔的模仿是一流的。他在阳光下挥动衬衫（想卖掉它），手紧抓着衣领（领子下有个洞，但塞萨尔的手正按在那个洞上），滔滔不绝地歌颂这件衬衫，不时插入毫无意义的题外话，猛地转向人群中某个人，信口给此人编个粗俗的绰号。他冷不丁地停顿（他直觉地懂得停顿在演讲里的价值），深情地亲吻衬衫，然后又开始以坚定而悲伤的口气叫卖，好像卖掉这件衬衫，就是剃下他心头一块肉，他这样做完全出于对邻居的爱：“我说，大肚皮，你肯出多少买我这件小心肝？”

《休战》结尾传出一记较沉重的音符，仿佛跟同伴分离之后，叙述者必须再次承受他记忆中的痛苦：

十月十九日（一九四五年）我抵达都灵……我的房子仍在，全家人都活着，无人期待我。我身体肿胀，胡须蓬乱，衣衫破烂，难以让家人认出来。我见朋友们过着丰满的人生，有温暖安全的食物、稳定的日常工作……我看到一张干净的大床，夜里它在我的体重下柔软地下陷（吓了我一跳）。数月之后，我才改掉走路时的习惯——眼睛总盯着地面，好似寻找可吃的东西，或匆匆捡起装进口袋，或转卖换面包。恐怖的噩梦仍出现在睡眠里，有时频繁，有时隔些时日。

《休战》的英译本出版后不久，英国一位批评家约翰·克罗斯（John Cross）写下了这些允当的评论：

我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称赞集中营幸存者的作品。确实，关于那最可怕的经验记录不可能没有价值。在这些境况下，倘若提出文学价值的问题，通常会显得不妥当……然而，可悲的事实是，这类写作的质量确实也重要，无论主题多么痛苦，大多（大屠杀）文学……仅在辛酸的纪实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见证者、幸存者和天生的作家是罕见的融合。

当然，表面看来，格罗斯确实说得切中肯綮：“写作的质量确实也重要。”然而，纵在颌首赞同之际，我们不可能不会察觉自己内心的抗拒感。在如此难以承受的主题面前，难道文学批评的全部手段及其所有巧妙的分类、区别不显得格格不入，甚至琐屑？大屠杀之后不久，意第绪语诗人亚伦·蔡特林（Aron Tsaitlin）写道：“万能的神自己……也要陷入深深的沉默。因为而今连呼喊也是谎言，连眼泪也是空洞的文学，连祈祷也是虚假。”在这个背景里，空洞的文学一词似乎力量万钧。然而我们也知道，事实证明大多数作家不可能保持沉默。纵使在拒斥“呼喊”的需要之时，蔡特林自己也不能保持沉默。

我宁愿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或许根本没有答案。较敏感的作家，在写作大屠杀之时，显然感到不能正面应对这个主题。在不堪述说的主题面前，无语、麻木的拒绝从心底涌起。倘若非接触这个主题不可，必须以擦边球的方式写作，保持高度的警惕，借助婉转的符号、间接的技法、迂回的叙述。那么反讽的是：一旦我们开始讨论应对这个主题的方式，就是回到文学批评的根本问题，从而最终也许仍